

# 论近代报刊对方志批评的革新

陈郑云

**提 要：**在近代方志转型的多重因素中，报刊上刊载专论、书评、图书广告等形式的方志批评发挥着重要作用。专论多出自方志学精英之手，实现了由重印象感悟式的传统方志批评向较有系统性、较富有思辨特点的近代方志批评转变，引领了近代方志转型的方向；专栏刊发以学术批判为目的的方志书评，营造了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方志批评舆论空间；方志类图书广告是市场营销语境下方志批评的一种形式，使方志常识与方志理论在一般知识阶层中传播。

**关键词：**近代报刊 方志学 方志批评 方志理论

20世纪初，由古代方志向近代方志转型的步伐加快。中国方志学开始发生深刻的转变，无论是修志宗旨，还是在方志体例、内容、章法诸方面，都较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sup>①</sup>，方志研讨的热潮兴起，学科意义上的方志学开始形成，方志学的分支学科逐渐完备。<sup>②</sup>在近代方志转型的多重因素中，方志批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传统方志学难以应对时代发展与社会变迁，新方志学者开始思考如何创新方志编纂方法与技术手段，如何变革方志体例与内容，如何运用新的学术方法研究方志学，这一连串的方志学术文化活动都少不了方志批评的积极参与。在古代方志向近代方志转型的进程中，出现了一种古代方志批评史上未曾有过的新型载体——近代报刊。笔者拟以近代报刊中的专论、书评、图书广告为对象，探讨逐步走向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的方志批评在近代方志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窥探近代报刊与方志学之间的关系。

## 一 专论——方志批评走向系统化、规范化的探索

传统的方志批评除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外篇》中有专论外，更多的是以相对零散的形式存在于方志序跋、文集、书札、提要之中，论述或浅尝辄止，或只言片语，缺乏批评理论的系统化、规范化。从传播速度上看，尽管这些文献也大多刻印传世，但与近代报刊相比，依然相对封闭与滞后，传播速度不及报刊快捷。这种局面到近代报刊大量涌现时才有了根本性转变。

20世纪初到1949年是古代方志向近代方志转型、成型期，其间近代报刊成为方志学者讨论批评旧志、探讨创新、发表论述的重要载体，一系列在方志批评发展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文章都首次发表在报刊上。方志学者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新见，尝试突破古代方志批评的传统形式，探索方志批评走向系统化、规范化之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学术文化的输入，史学领域批判“君史”、提倡“民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潮，在“新史学”与旧史学论辩的大背景下，学者在《新世界学报》等刊物发表专论批评旧志。1902年，陈怀首先在《新世界学报》发表《方志》一文，对旧方志提出批评：“今之方志者，吾窃悲之，亦犹是私史之常例耳。其文详于言沿革而略于微风化，其体善于

① 参见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188页。

② 参见许卫平：《略论民国时期方志学之成就》，《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1期。

事铺张而细于资激发，彼亦犹是私史之常例耳。况于涂附车载藉科举为声华，博引繁称，作点名之官簿，芜秽不治，徒污笔简，此亦俨然一方志哉。章实斋曰：‘今之所谓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游戏小记短书，清言丛说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牍，江湖游客，随俗应酬而已耳，缙绅每难言之。’夫章氏之言，未足以证方志之荒谬无理也。夫以流俗相沿，藉观风气美恶杂出，龟鉴斯存，固以为琐且极矣。然我犹未敢厚非者，以其与民务尚有关系之故，而非若今之方志所载，如登科记职官册之一无重轻者矣。我且为今之修方志者大声以告之曰：‘方志，民史也。’然则，方志之于史亦重矣。”可见，当时的方志学界是存在很多问题的，陈怀所处晚清时代的方志，已经沦为私人的历史。有鉴于当时方志的种种弊端，陈怀明确提出“方志民史也”的观点，强调“方志，于民族最亲，而于民事最悉”，认为方志能最贴切地记录国家、民族的历史，能最详细地记录百姓、人民的历史。他在文中呼吁：“方志者，我民之所群得而从事者也；而修方志者，我党群所得而执其权者也。”“方志之于史，一隶属耳，而民之存于方志者，自一方以至于十而百而千而万，积至小之地以达之于其大，积至寡之民以达之于其众，而居然一世界史之主人翁矣。”<sup>①</sup>陈怀以《新世界学报》为平台，发表专文提倡把方志作为国史并且推行于天下，这也是一种修志要以民为中心的方志观，是基于当时修志着重于帝王将相，而忽略了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理性思考。

我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方志学”这一概念是在《东方杂志》上，作为“新史学”的领军人物，梁启超于1924年在《东方杂志》发表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成绩》，其中第七章名为“方志学”。梁启超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把方志之学融入正史之中，肯定方志学的正统地位。他也对旧志官方集众修志的做法提出批评：“方志中十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语于之林。虽然，以吾侪今日治史者之所需要言之，则此二三千种十余万卷之方志，其间可宝之资料乃无尽藏。良著固可宝，即极恶俗者亦未宜厌弃。”因此，修志“纂集旧文，不自著一字，以求绝对的征信”，指出修方志大患在有材料，悉入志中，对于材料不加鉴别，这种做法是材料的堆积，为治方志所尤忌。而相较之下，“私家著述，性质略与方志同者。此类作品，体制较为自由，故良著往往间出”，强调修志“目的专以供国史取材，非深通史法不能从事”，因此，方志的资料应尽可能详尽，“其间可宝之资料乃无尽藏也，良著固可宝，即极恶俗者，亦未宜厌弃”，原因是“吾侪披沙拣金之凭藉，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中窥见消息”，所以，“方志之著述，非如哲学家文学家之可以闭户瞑目其理想，而遂有创获也，其最主要之工作在调查事实，搜集资料”<sup>②</sup>，不主张闭门造车或单纯抄录古典文献，要实地调查，且保持第一手资料的真实可靠。梁启超在《东方杂志》刊发这种系统化的批评专论，已达到了构建“方志学”学科体系的高度。

志书体例是方志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学者在《河北月刊》《金陵学报》《图书季刊》等报刊围绕方志的编纂体例、结构、章法等发表了一系列专论。1933年，瞿宣颖在《河北月刊》发表《志例丛话》，指陈明代修志的弊病：“明以来官绅陋习，好张门户之见，喜营流俗之名，动攘前人之作为己有，故每修志一次，必将前志毁荡无存，甚至前志修成甫及数年，又复更张，所以志多滥而庸也。”进而批评：“旧志体例既多，未免分门别类，支离破碎，久为有识所诟病。凡志

① 陈怀：《方志》，《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7期，第32—33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续）》第七章《方志学》，《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18期，第92—93页。

之佳恶，不待烦言，但阅其门目，便知其有无鉴裁之力。”“旧志例以图冠于册首，而表次于传前，积习相承，不知何意。夫图与表，皆辅文字所不及，自宜散入各篇为是。”“旧志每以琐事零闻不入正志，别为一门，或曰杂录，或曰志余，或曰轶闻，或曰瓌记，其中实皆绝好史料。”<sup>①</sup>瞿氏尖锐、深刻地批评了旧志的种种弊端。万国鼎于1935年在《金陵学报》发表《方志体例偶识》，对旧志的书写方式、行文特色提出批评：“旧志之大病，在于往往仅为片段之簿录，有似不完全之类书，而鲜条贯之论述。如志物产，则但在物名，不详其分布重轻；或但引录‘前志’及《本草纲目》《广群芳谱》之属，而不载现状；或偏于考据，辨证名物，而无一字涉及本地之生产情形。又如志地理，但记山名水名，使人阅后，不能了然于天然地形及其产业民生之关系。其次为详所不宜详，略所不应略，不相干者，连篇累牍，而真有关系者则恒失载。至于浅人杂凑成书，文士好弄笔墨，道学先生藉以卫道，胜国遗臣别有寄托，借人物于异地，侈胜景于一方，讹以传讹，误中复误，亦所在多有，常为学者诟病。”<sup>②</sup>黎锦熙于1939年在《图书季刊》发表《方志今议》一文，批评城固旧志“体例内容皆欠精备”，提出“今日而修方志，决非旧志之旨趣与部门所能范围”，认为章学诚所创修志的义例“横拓之领域，由时代之进展，亦颇感其未尽适宜而殊嫌不足也”。于是，确立“明三术、立两标、广四用、破四障”的四项修志原则。所谓“明三术”，即修志应先了解“续、补、创”三种方法；“立两标”即“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广四用”，即方志可作“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旅行指南”之功用，以符合时代需要；“破四障”，即志书编纂要“类不关文”“文不拘体”“叙事不立断限”“出版不必全书”<sup>③</sup>。通过批评旧志弊病，他提倡编修方志在体例、形式、内容等方面都应有所创新。此外，还有张其昀在《史地学报》刊出的《方志之价值》（1923）、吴景超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中国县志的改造》（1933）、傅振伦在《禹贡》登载的《方志之性质》（1934）、沈炼之在《地政月刊》刊载的《方志体例和内容的演变》（1935）、王葆心在《安雅》刊发的《方志学发微》（1935）、庄为玠在《厦门大学学报》刊登的《方志研究刍议》（1936）、胡行之在《文化建设》发表的《论方志的编辑》（1936）、吴宗慈在《江西文物》刊发的《论今日之方志学》（1942）、瞿兑之在《中和月刊》发表的《方志余记》（1942）、寿鹏飞在《国学丛刊》登录的《方志本义管窥》（1944）、韦启盛在《安徽文献》刊登的《方志之种类及其价值》（1948）等方志批评专论。

从以上专论可以看出，《新世界学报》《东方杂志》《河北月刊》《金陵学报》《图书季刊》《史地学报》《独立评论》《禹贡》《地政月刊》《文化建设》《安徽文献》《国学丛刊》等报刊在推动方志批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刊载专论或批评旧志的得失利弊、或论述方志编纂方法、或评价方志论著，大多可以归入方志批评专论中。文章多出自方志学精英之手，突破了传统方志批评的形式，逐渐向概念清楚、论证有力、论据充分、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论文和论著发展，厘清了方志批评史的主要脉络，也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指引方志批评走向系统化、规范化之路，客观上助推了由古代方志向近代方志转型的历史进程。

## 二 书评——方志批评实现栏目化、固定化的路径

书评是近代报刊兴起后才逐渐在中国出现的一种新兴文类，在学科发展渐次迈入稳定的20

① 瞿宣颖：《志例丛话》，《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第1期，第5页。

② 万国鼎：《方志体例偶识》，《金陵学报》1935年第5卷第2期，第368页。

③ 参见黎锦熙：《方志今议》，《图书季刊》1939年第2期，第101—102页。

世纪30年代前后，史学类书评亦开始大量涌现在各种不同形式的学术期刊和报章杂志之中。<sup>①</sup>近代报人已将新书评介视为报刊的重要使命，“别其精粗，妄为评论。择其善者为海内读者之介绍，择其否者为海内译者之箴规”。新书评介是了解学界动态的重要渠道，更是学术批评的重要模式。<sup>②</sup>作为一种作者和读者之间对话的文体，书评介绍或评介新书意味着对于学术的品鉴，而方志类书评中的“评”则是研究方志批评的重要依据。

近代报刊上关于方志书评栏目有的直接名为“书评”，有的称“图书评介”，有的叫“图书介绍”，旨在通过评论新近出版的方志著作或志书来向人们介绍方志学动态。1935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李泰棻所著《方志学》，随即掀起方志书评热潮。《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书评”专栏刊发季崱为李泰棻所著《方志学》所撰书评，评价：“全书都一册三百二十面，洋洋二十余万言，关于方志之意义价值以及编修方法等，可谓纲举目张，应有尽有。当兹各省竞重方志，与公私藏家争蓄邑乘风气方盛之际，此书宜值得推介于读者之前。”又说：“惟矣不无疵累处，既经吾目，不容缄默，辄摭陈于后，以商于著者。”其后，对于书中的“艺文不著生人著作之不当”“余对方志内容之三增”“余对方志内容之拟目及序例”等内容提出自己的观点与著者商榷。季崱认为书中“对于近人研究方志学之成绩，如瞿兑之《方志考稿》、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之类均得联类一述。即近年来新纂之著名邑乘，对于旧志改进者颇多，孰当孰不当，亦可详为臧否，以示来者也”。而且“全书校对殊草率，一翻自序，即有鲁鱼”，其他错误，“殆难缕指计统，有望于再版时之订正”。总之，李泰棻“折衷众说，佐以经验，撰为此书，虽中间瑕瑜互见，然而斐然述作，不失为近日出版界之明证”<sup>③</sup>。《禹贡》杂志“书评”专栏刊发瞿兑之所撰书评《读李氏方志学》称：“李君这部书，还是讲方志学的第一部完整著作，我从前所做的《方志考稿》，仅是一种读书杂记，现在看来幼稚错误的地方很不少，而李君这部书里还再三的征引，且加以称道，实不胜其惭愧。”<sup>④</sup>《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书评”专栏刊发高迈所撰书评，认为该《方志学》一书有认识精详、观点正确、拟目确当、批评有方、经验丰富5个特点。“确为当今有价值的著作之一。其不事抄袭，独具卓见，是其最大特点。他若词简意赅，章节分明，尤其为小者焉。”“（书中）对于清代方志未能论及，倘于再版时能加以增订，使成为整个系列之著作，谅亦海内同好所共企盼焉。”<sup>⑤</sup>高强调了新书的理论价值，评论中肯，也指出了缺点。

从近代报刊栏目设置情况来看，刊发方志书评还有：1936年，潘光旦在《清华学报》“书评”专栏发表为朱士嘉所著《中国地方志综录》所撰书评，指出该书“是许多做学问的人，可以利用而应当感谢的一本书”，“全书最大的效用自然是便检查”，“编者搜访所及，一起发现不同的方志五千八百三十二种、九万三千二百三十七卷，以出版的年月论，上下八百余年；以地方的单位论，纵横跨二十八行省及西藏内蒙二地，包罗之广，是无须说得的”，“排列的次序既很合习惯，统计的图表又极醒目，又附有索引，所以检查起来是很方便的”<sup>⑥</sup>。作者重点强调了著作的实用性。1933年，《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介绍与批评”专栏发表罗香林为朱

① 参见刘龙心：《寻求客观对话的空间——1930年代中国期刊报纸中的史学类书评》，《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年第3期。

② 参见刘开军：《晚清史学批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③ 季崱：《书评：方志学》，《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5年第4卷第2期，第4页。

④ 瞿兑之：《读李氏方志学》，《禹贡》1935年第3卷第6期，第38页。

⑤ 高迈：《书评：方志学》，《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1935年第128期，第12—13页。

⑥ 潘光旦：《书评：中国地方志综录》，《清华学报》1936年第11卷第1期，第259—260页。

士嘉所编《中国地方志备征目》撰写的书评，批评方志研究现状：“吾国流传方志之富，及其关系民族国家生机生命生活之所表白，其事至明，其义至显。然而反观吾国学人从事方志研讨或考索者，聊聊可数？”指出方志研究不兴盛，是“因方志度藏不一，购取无方；普通县邑，其学人不易聚集群材以自校核之故”，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地方志备征目之作，不容一刻缓也”，而该编“应时势需要，根据国内外公私立图书馆，及各丛书，各私人收藏之中国地方志目编订而成”。他批评该目录“资料未征完备，故所录仍多挂漏，私家藏籍，未能遍考，固无论矣。即各地公家藏志，似亦仍多未采录者，信乎博综撰述，不易言也”。他又以广东省为例，指出是编“遗漏必多”，其他各省志，“有无遗漏，自亦滋人疑问”；“于各志年代，亦往往有不慎误笔”，希望“再版时酌量补正”。同时，他对于编纂备征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此类备征目，必先调查各省市公私立图书馆或藏书楼，将其所藏方志之种数卷数汇刊为表，而后依其所藏，综核书名年代，纂为备征详目，其已寓目者，则当各为提录，撷其精要，品其得失（略如瞿兑之氏《方志考稿》），记其皮藏所在，分时分地，汇订为编，使阅者一望而知何时何地有何种志书何种材料，须如何访取探究。盖不如此，不足以副征录方志之本义也”<sup>①</sup>。其批评固有道理，但也指出编纂备征目方法值得推广。此外，1940年《读书通讯》杂志在“图书评介”专栏刊发黎锦熙《方志今议·序》一文，自述其《方志今议》的成书过程。<sup>②</sup>

这些近代报刊上发表的栏目化、固定化的方志书评，或评介新书、或讨论商榷、或批判旧志、或阐发新见，兼有导读和评论两种效用，或许因作者的学术文化背景不同，对新出方志或理论著作的批评未必精准，但从中仍可观察到近代知识分子群体视野下的方志学发展大势。书评创造了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方志批评舆论空间，是方志批评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三 图书广告——市场营销语境下方志批评的一种形式

“新出书籍，非广登告白，读者无从知悉。”<sup>③</sup>传播图书信息，让尽可能多的受众了解图书出版情况，促进销售，是图书广告的首要目的。随着近代报刊大量出现，出版商为了吸引读者，提升销量，经常在报刊发布促销广告，介绍相关信息，引起读者的关注。透过这些图书广告的内容与形式，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的历史风貌、价值取向、学术氛围和审美风尚，使我们看到一个多维的历史空间。<sup>④</sup>广告的直接目的虽是为了营销，但既然要扩大影响力，提升图书的知晓率，就必须围绕图书的内容、价值进行简要品评。因此，关于方志学的书籍广告在市场营销语境下仍流露出一定的方志批评信息，这些图书的广告词行文简洁流畅，通俗易懂，点评准确，受众面也相对广泛，有助于方志常识在一般读者中的传播，是市场营销语境下方志批评的一种形式。

综合类期刊上的方志类图书广告一般有一定的学术性。《东方杂志》上刊登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方志学》一书广告词曰：“方志一科，千余年来，继日增多，然就内容体例方法之作，除章实斋《文史通义外编》及《章氏遗书》稍有议论外，余者皆不谈此道，著者本其廿余年治史心声及总纂《绥远省志》之经验，著为此书。内容十之二系采实斋之长，十之八系著者依时代

① 罗香林：《介绍与批评》《中国地方志备征目一册》，《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933年第1卷第4期，第81—82页。

② 参见黎锦熙：《图书评介：方志今议序》，《读书通讯》1940年第8期，第11—12页。

③ 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270页。

④ 参见李晓源：《论中国古代书籍中的广告》，《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及史学潮流之要求，发为新议。书计十三章，前五章论方志之性质及与其他学科之关系，以及旧志之烦长。第六章后乃述著者对于修志之主张以及修志之方法。诚今日修志之唯一参考良书。”<sup>①</sup>寥寥几句话对方志学论述的源流、内容、特色都做了简要评价。又如《中国地方志综录》一书广告词曰：“《中国地方志综录》系根据国内外各公私藏家所藏现存方志目编成，断自民国二十二年，计搜罗现存方志五千八百余种，每书除臚举书名外，并详其卷数、编纂人、编纂时期、版本与藏书所在，其有关本书之记述或考证，入备考类。末附统计图，尤足以考见历代修志之迹，与文化之关系，此为前所未有之作。凡研究史地社会科学与夫修志者尤宜人手一编也。”<sup>②</sup>此等评价，绝非虚言。再如《中国方志学通论》一书广告词曰：“著者往年在北平大学女子学院任职，撰成《方志学讲义》，又本编修《热河县志》及预修《河北通志》之经验，略事修正，去岁又在北平诸大图书馆广览志乘，因之就原稿加以增订，成书八篇，厘为十九章，于吾国方志之意义、范围、方志之演进、整理及撰述，辨析其明；而于其源流、派别、利弊、得失以及今后修志方法、新志体例，书之尤详。”<sup>③</sup>评价言简意赅，精准到位。这些方志类图书广告出自何人手笔，现已无从考证，但从广告的遣词造句来看，绝不是“非专业”人士可以执笔的。此外，《东方杂志》还刊发过《方志今议》《方志序例》《志例丛话》等书的广告。

专业类刊物上的方志类图书广告内容主要推介新书，相对略长，以达到商业营销的效果。如1926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推介白眉初编《中华民国省区全志》时曰：“白眉初先生，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主任兼地理教授，竭二十年之精力，从事考究中国地理，或用公文征求各省区官府之报告，或用表格随时随地征求私人之调查，更遍考古籍，以溯渊源，复搜罗时贤著述，名人游记，尤肆力检查中外报刊杂志，又参考中西文之各种典籍，以期观察之正确。”“全书印竣，累至案上，可盈二尺，诚洋洋大观，宛然一民国全部状况之真实照片也。允宜人手一编、家藏一部、校置一函，而全国各图书馆尤应乘预约期间购置数份，以供国人酣恣阅览。”<sup>④</sup>广告主要向社会推介新书，以期促销。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推介朱士嘉撰《中国地方志备征目》曰：“地方志书之重要，近颇惹人注意，以故公私搜藏颇成一时风尚。如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东方图书馆、天津任氏天春园、南浔刘氏嘉业藏书楼，莫不蔚为大宗，雄视海内，且有专目，以纲纪之。燕京大学图书馆亦正广事搜罗，且由朱士嘉君参考国内外二十二个公私图书馆方志目录，汇为《中国地方志备征目》一编，共著录四千九百十二种，欲按目购求，法之善也。”<sup>⑤</sup>1936年，《图书季刊》推介谭新嘉编《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二编》曰：“纵观全书，共收入省志县志八百六十二部，编次体例与二十二年该馆出版之方志目录相同，各志下注明卷数、册数、纂修者姓名、版刊年月及有《无艺文志》、《金石志》等，必备之条款，卷末殿以索引，尤便检阅。”<sup>⑥</sup>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推介《故宫方志目》曰：“方志为研究一代史事、各地风俗之重要史料。周代且有专官以司此事，历代于此俱甚重视。六朝以降，地志之书，与日俱增，蔚为中国文献上之一大宗。以前言治术者，莫不以读方志为亟务，转至近代，乃遭忽视。迩来学术渐兴，方志又始重见于世。瞿君兑之《方志考》已稍稍发起闕藏。然全国之大，所

① 《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4期，第25页。

② 《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4期，第12页。

③ 《东方杂志》1936年第33卷第5期，第31页。

④ 《新书介绍：中华民国省区全志》，《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6年第2卷第2期，第12—13页。

⑤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2年第6卷第4期，第84—85页。

⑥ 《图书季刊》1936年第3卷第3期，第92—93页。

谓方志者，究有若干？各地所藏方志究有几何？是皆亟应先知之事。已前学部所藏，方志目已辑成书。上海涵芬楼亦印有一目，此外尚不多见。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以故宫所藏，益以清史馆近藏所收，自明正德以迄清季，共得一千四百余种，编为《故宫方志目》。”<sup>①</sup>1939年，《图书季刊》推介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未收方志的《新修方志十二种》曰：“方志之书，体例与史略同，然所记载限于地方之史地，恒较史书为翔实，其足资行政之鉴法，与人民之观感者，较史尤为切。观夫历代所修方志，其保存史料，至称繁富。如地理之沿革，制度之损益，食货之盈虚，户口之息耗，学校选举之盛衰，社会风俗之纯驳，与夫人物之兴替，文献之征存，利弊得失，巨细革陈，而且资料又直接取诸官署档册，碑碣墓铭。顾炎武所谓‘采铜于山’者也。宜为学术界所重视。”其后，逐一简评新修方志，先依次录志书名称、卷次、修纂者姓名、刊印时间、版本、卷目，再叙修志源流，后点评志书特色。如评《钟祥县志》“编辑尚称得体”；评《犍为县志》“一洗志书惯习，尤为有识”；评《榴江县志》“尚称详备，堪资参政”；评民国《昭通县志稿》“体例多采新体，而资料亦翔实可征”；评咸宁《长安两县续志》“体例多仿前志，间有增益”<sup>②</sup>。联系近代方志学发展大势，这些图书广告，已然超越了市场宣传的范畴，折射出图书广告在连接方志学与社会群体方面所做出的有益尝试。

作为一种新兴媒介，近代报刊为方志批评提供了专论、书评、图书广告等多种新形式，新事物和新思想成为修志观念和批评方法的重要来源，初步形成了以媒介为中心的方志批评公共空间，报刊媒介传播方志知识和规范批评的近代方志转型机制开始建立，报刊生产过程中确立的投稿、稿酬、版权等制度转化为近代方志批评的生产机制，报刊流通过程中建立的邮递、派送、阅读等机制转化为近代方志批评的传播机制。报刊的方便迅捷性、新闻时效性、阅读灵活性，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将最新的方志批评动向传递给学界，突破了传统以专书（如《文史通义·外篇》）和序跋、书札、提要等为形式的方志批评路径，弥补了传统方志批评载体的缺陷，加快了方志批评的传播速度，缩短了批评者之间相互回应的周期。总之，近代报刊拓展了方志批评空间，促进了方志批评革新，加速了由古代方志向近代方志转型的历史进程。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本文责编：周全

<sup>①</sup>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1年第5卷第4期，第121—122页。

<sup>②</sup> 《图书季刊》1939年第2期，第101—102页。